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代解读

# 激进政治的兴起

马克思早期政治与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当代解读

邹诗鹏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

DO-0  
102

013043006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代解读

# 激进政治的兴起

马克思早期政治与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当代解读

邹诗鹏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651116

DO-0  
1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进政治的兴起:马克思早期政治与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当代解读/邹诗鹏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代解读)  
ISBN 978-7-309-09127-4

I. 激… II. 邹…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②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  
IV. ①D0-0②A81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4405号

激进政治的兴起:马克思早期政治与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当代解读  
邹诗鹏 著  
责任编辑/陈 军 方尚琴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61 千  
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9127-4/D·577  
定价:32.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航

C1651116

# 目 录

<b>导言：让僵化的制度跳起舞来</b> .....	1
<b>第一章 宗教批判问题</b> .....	26
一、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的现实基础 .....	26
二、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之终结与马克思宗教批判之开启 .....	34
三、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当代意义 .....	55
（一）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理解与评价 .....	55
（二）从现代精神文化转型上把握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 .....	58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思想的批判性审视 .....	64
<b>第二章 关于“消灭哲学”</b> .....	70
一、马克思早期的哲学立场 .....	70
二、“消灭哲学”与“人的高度的革命” .....	81
三、从“消灭哲学”到“哲学的终结”：批判性对话 .....	95
<b>第三章 黑格尔内部国家制度批判</b> .....	105
一、黑格尔内部国家制度的基本理路 .....	106
二、黑格尔内部国家制度的前提批判 .....	113
三、“王权”批判 .....	119
四、“行政权”批判 .....	129
五、“立法权”批判 .....	142
<b>第四章 市民社会问题</b> .....	174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若干理论背景 .....	175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观的批判 .....	183
三、唯物史观的形成与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演进 .....	189
四、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当代视域 .....	197
<b>第五章 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 .....</b>	<b>203</b>
一、“人的高度的哲学革命” .....	207
(一)“让制度跳起舞来” .....	207
(二)从宗教批判到政治批判 .....	211
(三)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 .....	217
二、马克思的政治批判与欧洲思想传统 .....	223
(一)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界分 .....	223
(二)马克思激进政治批判思想与欧洲古典传统 .....	227
(三)马克思激进民主主义思想与自由主义传统 .....	233
(四)马克思所超越的德国浪漫主义传统 .....	236
三、政治解放、人类解放及其当代视域 .....	246

## 导言：让僵化的制度跳起舞来

“让僵化的制度跳起舞来！”这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下称《导言》）中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口号。笔者也特别愿意同读者一起，通过本书融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以及政治哲学的现当代视野，解读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论犹太人问题》为主的青年马克思有关政治与法哲学批判著述。

我们的研究将表明，青年马克思在激进政治以及激进民主主义上作了一次着意的逗留。这一逗留意味着马克思在先前确立的基本的唯物主义及无神论立场后，完成了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向激进的政治批判的主题转变。选择对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哲学展开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表明，马克思已从自然社会结构转入政治社会结构的研究；由此展开的政治批判与市民社会批判，则为唯物史观及科学共产主义的确立初步奠定了基础。对于政治思潮的演进而言，1843年马克思在激进政治主题上的逗留，意味着他在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思潮的转变过程中，一定经历了激进民主主义阶段。这一逗留积聚并吸纳了相关社会政治思想资源，培植起一种既生发于、又异质于自由主义的新的社会政治力量，且与已经兴起的保守主义区分开来，从而使得随后展开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更加稳健并富于成效。通过对1843年马克思有关政治哲学与法哲学批判思想的解读，可以看到，青年马克思是如何与青年黑格尔派渐行渐远，如何实现对欧洲近代思想传统的批判与超越；还可以从源头上看到，19世纪40年代欧洲的政治思潮何以从自由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这一转变于1848年完成，而1843年时它正在积累能量，蓄势待发。正是借助于在1843年开始确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马克思在1845年彻底实现了从激进民主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相比之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1844年手稿》）则是在激进政治及激进民主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之间的一次缓冲。而且，《1844年手稿》中的哲学人类学，一方面应该被看成是先前的哲学—历史学，即政治批判活

动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应该被看成是在本手稿中初步呈现并在随后全面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原则。在这一意义上,不理解马克思在1844年前的工作,尤其是1843年的法哲学与政治哲学批判,也就不可能理解《1844年手稿》,更难以进一步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

—

不妨就从现当代理论对《1844年手稿》的重视谈起。在《1844年手稿》已经充分地进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甚至于完全支配青年马克思思想研究的今天,要重点探讨马克思在1843年前后的政治哲学与法哲学批判思想,就需要回溯到《1844年手稿》。在很大程度上,理论界对于《1844年手稿》的重视很可能让人们“小看”了青年马克思的政治与法哲学著述。

20世纪30年代《1844年手稿》的再发现,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极大兴趣,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尽管卢卡奇一度并不这样认为,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认为,《1844年手稿》与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山作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题是高度一致的,即都是哲学人类学的主题。关于《1844年手稿》,卢卡奇在20世纪60年代终于承认,这部手稿已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sup>①</sup>。马尔库塞认为:“这部手稿可能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和最初含义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sup>②</sup>弗洛姆说:“马克思的哲学在《1844年手稿》中获得最清楚的表述,它的核心问题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问题,人就是他实际上呈现出的那个样子,人的‘本性’展现在历史之中。”<sup>③</sup>拉宾则指出:“《1844年手稿》是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形成道路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sup>④</sup>约·赫普纳指出:“在这部手稿中完成了马克思学说诞生过程中的决定性的一步。这

- 
- ① 卢卡奇:《〈经济学哲学手稿〉简论》,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7页。
- ② 赫·马尔库塞:《关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材料》,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第298页。
- ③ E·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见《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5页。
- ④ 尼·伊·拉宾:《〈1844手稿〉对共产主义的经济和哲学论证》,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第29页。

部手稿作为一年以后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原则的直接准备阶级,使人们可以深刻了解马克思试图为解决当时工人阶级力求解决的问题而进行的精神方面的斗争。”<sup>①</sup>佩特罗相指出:“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人的问题、人道主义的问题。”<sup>②</sup>亨·德曼认为:“这部著作比马克思的其它任何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sup>③</sup>雅恩与巴季特诺夫等人也认为,《1844年手稿》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sup>④</sup>。

当然,对于马克思《德法年鉴》的研究,《1844年手稿》的再发现也引发了新的理解。此前,研究通常认为,《德法年鉴》实际上确定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不仅确立了唯物主义及无神论立场,而且通过市民社会批判已经初步开启了唯物史观。与此同时,《德法年鉴》时期所形成的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也为后来马克思展开资本主义批判打下了铺垫。从《德法年鉴》时期的主题政治批判,中经标示着正式形成马克思唯物史观及新世界观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既是实践批判,也是意识形态批判),再到《资本论》,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样的视角乃是一以贯之的资本主义政治批判的主线。不过,在这样的理路中,究竟如何看待马克思的人类解放问题,并不是很清楚。在这一意义上,《1844年手稿》的再发现,倒是提醒人们注意:在《德法年鉴》之后,一方面,部分地受益于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启发,马克思从政治批判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另一方面,马克思也为政治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确定了人道主义以及哲学人类学的原则——因此,后来形成的科学共产主义,不仅在政治学与经济学上是可行的,而且在哲学高度上也是可能的。有一些观点认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题的《1844年手稿》甚至于比专门化的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题的《资本论》更加丰富<sup>⑤</sup>。阿尔都塞显然不满于这样一种状况,但他却走向了另一极端,即只承认《资本论》的科学性,而把《1844年手稿》看成是青年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的集中体现,甚至

① 约·赫普纳:《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解》,同上书,第96—97页。

② 玛·伊·佩特罗相:《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形成》,同上书,第175页。

③ 亨·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同上书,第348页。

④ 同上书,第44页。

⑤ 这种观点显然把《资本论》看成了缺乏人道主义旨趣的著作,甚至于看成是实证主义传统在马克思那里的再度复活。

于把《德法年鉴》时期的著作也看成是同一类话语。阿尔都塞当然也注意到了青年马克思著作的复杂性及其差异,但在服从于其“认识论断裂”的前提下,他并没有注重于把握《德法年鉴》时期思想的特殊性。

无疑,《1844年手稿》的再发现,为人们带来了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以及对马克思与相关思想关系的新理解。马克思在1843年完成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随即展开经济学研究,具体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1844年手稿》乃这一任务的初步落实。这一工作,较此前《莱茵报》时期有关物质利益的困惑以及《德法年鉴》时期有关市民社会批判,对1845年新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的正式提出显然提供了经济学方面更加有力的支撑。物质利益的困惑所涉及的只是经济问题,还不是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德法年鉴》时期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仍然只是政治批判:两个时期的批判都还没有完全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层面。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对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实质,更为深刻地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在《1844年手稿》中首次表现出来的。当然,除政治经济学批判外,《1844年手稿》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维度,这就是哲学人类学。这是一个特别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的维度。这一维度不仅使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丰满起来,而且使其唯物史观、科学共产主义以及资本批判活动奠定起了坚实的哲学人类学基础。正是在哲学人类学基础上,马克思使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统一起来。从1843年马克思唯物主义及其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确立,到1845年唯物史观与科学共产主义的正式创立,在此期间《1844年手稿》蕴含着哲学阐释、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社会理论等多重内涵,正是通过《1844年手稿》,马克思确信自己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而在他的影响下,共产主义也正在趋近于科学社会主义。《1844年手稿》也影响了《资本论》的研究。在实证主义传统再度复兴的背景下,尤其是在第二国际的影响下,《资本论》的研究渐渐走入了一种僵化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与融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哲学人类学于一体的《1844年手稿》相比,《资本论》的冷冰冰的分析显得直观而单调。阿尔都塞甚至认为,“如果用今天的观点来‘客观’地评价《资本论》,这部著作无非是对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一种直观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而《1844年手稿》,特别是其中异化、人道主义、人的社会本质等概念,则是这种直观的主要哲学表述”<sup>①</sup>。

阿尔都塞看得很准,人们(大部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抬高《1844年手

---

<sup>①</sup>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6页。



稿》而贬低《资本论》，无非是为了让马克思主义回到青年马克思，让一位激烈的资本主义批判者回位于人道主义者，借此也可以对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提出批判。“哲学家、思想家和宗教家们纷纷投入到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中去，他们要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本原，要他承认成年马克思不过是化装了的青年马克思。或者，如果马克思在年龄问题上坚持不肯让步，他就应该承认成年时期的罪过，承认他为了经济学而牺牲哲学，为了科学而牺牲伦理学，为了历史而牺牲人。”<sup>①</sup>阿尔都塞自己则是通过提出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认识论断裂”，从而“重新确立”《资本论》的科学地位。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框架内，蕴含着哲学人类学思想的《1844年手稿》，依然是呈现青年马克思思想中意识形态概念的典型文本。阿尔都塞依当时的惯见把《1844年手稿》定位为哲学人类学著作，也正是为了否定这部著作。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阿尔都塞只是把青年马克思分为两个时期，即1842年的理性自由主义阶段与1842年至1845年的理性共产主义阶段，而理性共产主义阶段的资源仍然是费尔巴哈<sup>②</sup>。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联》一文中，阿尔都塞把《1844年手稿》看成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阐明的哲学革命之前的“一部爆炸性的文本”。在这一文本中，“黑格尔，在被强制性引入费尔巴哈之后，引发了青年马克思巨大的理论矛盾，导致了他与理论人本主义的决裂”。这一决裂最终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现的，因为“在《1844年手稿》中发现了很多关于这种‘理论人本主义’的文字”，而“马克思赞同的理论人本主义就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sup>③</sup>。这就是说，1844年之前的马克思，其最高的哲学水准依然是费尔巴哈。显然，在这样一种定位中，青年马克思的法哲学及政治哲学批判思想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 二

问题当然涉及对青年马克思思想中黑格尔主义要素的把握。青年马克思一直没有成为黑格尔主义者。1844年以前，马克思受青年黑格尔派影响尤深，

①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6页。

② 同上书，第18页。

③ 阿尔都塞：《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I〕》，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6、360页。

通过接受费尔巴哈,马克思也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彻底清算,至于1845年以后他自己的理论学说形成时,更是同黑格尔的观念论鲜明地断裂开来。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青年马克思更多地关注康德和费希特,对于黑格尔的研究,则集中于博士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和《1844年手稿》三部作品。但这三部作品的侧重点不同。博士论文不是直接的体现,按照陶里亚蒂的解读,博士论文在很多方面借助并发挥了黑格尔的术语<sup>①</sup>。《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导言》则是对通常被看成是保守主义文本的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哲学的批判,而且这部著作的水准也被认为只是费尔巴哈的一个翻版(即运用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逻辑)。而在诸如思辨哲学及宗教的批判、基本的哲学人道主义以及激进政治情绪之类话语之外,并没有对黑格尔法哲学作出更有说服力的批判。1843年之前,马克思更多的是在青年黑格尔派以及费尔巴哈的意义上把握黑格尔哲学。阿尔都塞断定:“在1843年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的自我意识是费尔巴哈式的意识。”<sup>②</sup>这就是说,这部手稿本身不过是对黑格尔法哲学所展开的费尔巴哈式的批判。当然,还有一个特别得到MEGA及相关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支持的说法,即《1844年手稿》中有关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以及辩证法思想的研究,主要是马克思自己所做的摘要与读书笔记,还不能看成是马克思的独创性的思想。意大利学者马塞洛·穆斯托即指出,“被错误地归为马克思第四手稿的部分,事实上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简介”<sup>③</sup>。但若结合手稿中实际刊出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上述判断并不公允。因为正是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借研习黑格尔辩证法,表达了很多独特的、并且对其以后的研究活动产生支撑意义的观点。至于向黑格尔的学习痕迹,倒表明马克思并没有仅仅满足于青年黑格尔及费尔巴哈,而是着力于内在地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其实,在马克思与黑格尔这两位思想巨人尤其是有思想联系的巨人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批判继承关系,而不是完全借助于他人而实现的思想批判。换句话说,正如马克思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真正继承者(如列宁正确地评价的那样,《资本论》才是“大写的逻辑学”),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是一种活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文本关系。

---

① 参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40页。

② 同上。

③ Marcello Musto, “Marx in Paris: Manuscripts and notebooks of 1844”, *Science & Society*, Vol. 73, No. 3, July 2009.

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的“序言”<sup>①</sup>表明，他最初试图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撰写一部法学与政治哲学专著，但马克思发现这一工作十分庞杂且不具体，而且涉及思辨哲学、法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多门学科，马克思遂把思辨哲学与具体学科分开，并准备对国家、法律、伦理以及市民生活进行单独研究，形成若干小册子，再以总结的方式与思辨哲学联系起来<sup>②</sup>。只是马克思从未完成这一庞大的研究计划。不过，按照诺曼·莱文的判断，正是《1844年手稿》中展开的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入研究，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对思辨哲学的批判，并把辩证法作为肯定的精神承继下来<sup>③</sup>。与卢卡奇肯定《1844年手稿》中的辩证法思想进而阐释哲学人类学及人道主义不同，阿尔都塞之所以肯定《1844年手稿》中的辩证法思想，则旨在揭示《1844年手稿》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并认为马克思是在《资本论》中才全面展现其科学结构的。就《1844年手稿》所包含的哲学人类学倾向而言，阿尔都塞无疑是把它看成是马克思1840年至1845年间不成熟时期著作即意识形态式的典型文本。在阿尔都塞那里，《1844年手稿》以及《德法年鉴》时期著述，都属于“理性共产主义阶段”<sup>④</sup>。

但阿尔都塞显然意识到了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阐述的辩证法思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通过《1844年手稿》完成了“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伟大综合”。

“依靠康德和费希特的帮助，马克思退回到了十八世纪末；依靠费尔巴哈的帮助，他退到了十八世纪理论历史的中心，因为费尔巴哈确实可算是十八世纪的‘理想’哲学家，是感觉论唯物主义和伦理历史唯心主义的综合，是狄德罗和卢梭的真正结合。人们不禁会问，马克思通过《1844年手稿》在最后关头突然完全回到黑格尔那儿去，他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所作的这一天才综合，是否就像把处在理论磁场两极的物体放在一起而引起的一场爆炸，而马克思就在这场极其严峻的经历中，就在‘颠倒’黑格尔这一为前人没有从事过的最彻底的考验中，就在马克思从没有发表的这部著作里，实际上体验了和完成了他的转变？谁要对这一奇妙转变的逻辑有一定的认识，他就必须看到《1844年手稿》理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国际版（即MEGA1）所编的“序言”，依MEGA2及相关文献学研究，乃笔记本Ⅲ的一部分。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③ 诺曼·莱文：《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占有》，英刊《批判：社会主义理论杂志》2005年第36—37期。

④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8页。

内容的丰富,并首先要懂得,从理论上讲,这部可以比作黎明前黑暗的著作偏偏是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著作。”<sup>①</sup>

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评价。阿尔都塞完全意识到,《1844年手稿》实际上已经包含着他自己所命名的“科学理论”,但是,《1844年手稿》中发挥到极致的理论人道主义,恰恰离随后展开的作为科学理论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去甚远。《1844年手稿》对阿尔都塞而言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困惑。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一困惑?笔者觉得主要是其所设定的认识论断裂将青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绝然对立起来,其理论姿态上的反人道主义妨碍了他对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确当认识。而且,当他在其复兴了黑格尔哲学方法的结构主义框架内重视《1844年手稿》时<sup>②</sup>,他实际上并不重视青年马克思此前的著述,包括《德法年鉴》时期的政治与法哲学著述。诚然,阿尔都塞也注意到了《德法年鉴》时期的作品。比如,他十分推崇的两位人物,德拉·沃尔帕以及科莱蒂,这两位阿尔都塞看来在当代真正有意识地把马克思与黑格尔在理论原则上区别开来的研究者,一致认为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和费尔巴哈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着一种断裂,而且这一断裂的位置就发生在1843年《导言》。阿尔都塞当然同意这一看法,但这种观点更加巩固了马克思1843年有关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著作不过是费尔巴哈思想翻版的说法。而且,按照这一分析,黑格尔原则在青年马克思思想中不断延迟,直到《1844年手稿》之后,才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中复兴。可见,阿尔都塞把握《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思想的方法,依然还是黑格尔主义。因而,比如当拉宾重视《莱茵报》时期以及《德法年鉴》时期著述,并把这些著述与唯物主义关联起来时,阿尔都塞依然作出如下评价:“拉宾的体系是黑格尔体系。”<sup>③</sup>马克思针对被马克思主义传统确定为保守主义典型的黑格尔法哲学及政治哲学的批判,并没有真正进入阿尔都塞的“法眼”。在他那里,青年马克思的作品,实际上是相关思想人物的混合。

“马克思在1840年至1845年间的命运不由黑格尔、费尔巴哈、施蒂纳、赫斯等人之间的假想辩论所决定,也不由马克思在他当时著作中或由恩格斯和列宁在

①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9页。

② 阿尔都塞对《1844年手稿》的肯定,实际上是其结构化《资本论》研究方法定向的结果,就是说,他力图把《资本论》仅仅看成是一部摒弃了人道主义的结构主义作品,因而当他面对同时包含着人道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的《1844年手稿》时,他必须让自己相信:这部著作中的人道主义所反映的正是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性,而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正是通过《资本论》而完善起来的。

③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48页。

他们后来的泛泛回顾中所反映的同一些人之间的辩论所决定。马克思的命运是由一些具体的思想家之间的辩论所决定的，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赋予这些思想家一个特定的形象，这个形象不一定同他们作品的历史身份相一致（例如黑格尔），而是大大超出了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加以引证和批判时所描绘的明确形象（例如费尔巴哈），当然也超出了恩格斯在四十年代以后为他们概括的一般特征。”<sup>①</sup>

按照阿尔都塞的分析，马克思实际上是在其思想定向中处理不同的人物及其思想。换句话说，这些人物及其学说在不同的层面服务于马克思所要展开的理论，因此也就谈不上马克思自身思想的稳定性及科学性。这当然也是现当代社会科学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人们认为，在当代思想视野里，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不过是从费尔巴哈、鲍威尔以及赫斯等人那里搬来的。这一看法令人质疑。因为它“小看”了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尤其是忽视了马克思早期政治与法哲学批判著述的意义。

### 三

1844 年之前，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如下五个具体时期：

一是大学及博士论文时期。通过在波恩大学特别是柏林大学的学习，在参与并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同时，马克思确立起鲜明的无神论与唯物主义立场<sup>②</sup>。

二是《莱茵报》时期。通过职业记者生涯及其接触到的社会现实，马克思开始形成理性的自由主义观，而物质利益的困惑则表明唯物史观的问题意识开始形成，也是其随后展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契机。

三是克罗茨纳赫时期。即 1843 年 6 月至 1843 年 10 月，这一时期马克思阅读了大量政治、法学以及历史的文献资料，留下了《克罗茨纳赫笔记》，并形成了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四是《德法年鉴》时期。1843 年 10 月至 1844 年 2 月，马克思撰写《导言》与《论犹太人问题》并刊载于《德法年鉴》第一期也是唯一的一期；《德法年鉴》

<sup>①</sup>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 51 页。

<sup>②</sup> 如果细分的话，这一阶段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838 年之前的青年马克思，主要是理性进化论者，推崇的人物是黑格尔，继而转向青年黑格尔派。博士论文阶段的青年马克思，开始转向无神论者，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开始形成。



第一期同时还刊发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英国状况》。

五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这一年,除完成《1844年手稿》外,马克思恩格斯还首次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此后便是马克思明确反叛费尔巴哈以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并宣告唯物史观的正式创立,标志性著述即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

上述五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大学—《莱茵报》阶段、《德法年鉴》连同克罗茨纳赫阶段、《1844年手稿》阶段。由此,《1844年手稿》中的哲学人类学及相关思想,乃是上述诸阶段积累及嬗变的结果。大学时期与《莱茵报》时期虽有区别,但都倾向于理性的自由主义,标志着马克思对欧洲启蒙传统尤其是自由主义传统的接受与追求。这一时期,马克思受卢梭、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海涅以及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甚大,这同时也是青年马克思哲学人类学思想的孕育时期。《德法年鉴》连同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开始脱离青年黑格尔派并诉诸费尔巴哈,在政治上转向激进民主主义,其表现为对黑格尔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自觉批判,以及对欧洲近代启蒙传统、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及历史法学派的自觉的批判与超越。在此期间,马克思处理了诸如宗教批判、哲学终结、市民社会批判以及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重要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思想出现了一个更新的时期,即《1844年手稿》时期。在那里,马克思明确其哲学人类学立场,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清理并初步重构了共产主义,从而为唯物史观及科学共产主义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里需要特别讨论青年马克思关于政治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关系的思想,这对于理解马克思1843年的政治与法哲学批判手稿与《1844年手稿》的关系十分重要。对马克思而言,政治批判乃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提。因此,重视《1844年手稿》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先前的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著作。仅仅把《1844年手稿》看成是哲学人类学著作显然是不够的,如果那样,就舍弃了《德法年鉴》时期的政治批判,并把一种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普遍主义的人类解放)作为青年马克思思想全部的哲学理据。这样一种定位有一个看似合理的根据,即认为马克思此前所阐述的政治批判与政治解放的关系,均只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革命意义上的,因而在认定马克思完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转变(一般认定为1843年)之后的《1844年手稿》中,主题不再是政治解放问题,而是人类解放问题,是有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正面阐述,而马克思在1843—1844年诸作品中对费尔巴哈的推崇似乎也直接支持了这一点。

我们不太同意这一说法。相比之下,《1844年手稿》中的政治批判内容不

如政治经济学批判那样明显。在《1844年手稿》“序言”里，马克思就交代，为使问题的讨论能集中进行，对于“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sup>①</sup>。因此，《1844年手稿》的主题自然是国民经济学批判，进而是立足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对相关社会政治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其中的政治批判则是从属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但如果否定这一作品的政治批判维度，显然不当。《1844年手稿》本身就是马克思当时拟展开的以“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题的初步成果，政治批判本身就是此书的一个维度。黑格尔只是在法哲学与伦理学方面确立起私有财产与国家的关系。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法哲学批判作品中指出，私有财产与国家的关系，首先是权利问题，是政治问题，接下来，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依然贯彻着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相统一的基本逻辑，而且，因为社会解放的突显，使得上述基本逻辑更为自洽，哲学人类学的立场更为坚实。就此而言，作为《德法年鉴》主题的政治与法哲学批判，正是《1844年手稿》中有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前提。正是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才可能在《1844年手稿》中更为从容地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不能脱离1843年的政治与法哲学批判来把握1844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对马克思而言，哲学人类学乃国民经济学批判的伴随结果。马克思坚信，只有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才能实现国民经济学以及实证主义的深刻批判。不过，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只进行了理论原则的提示。在马克思那里，这一批判的实质，是基于费尔巴哈式的哲学人类学及其相关社会主义思想，对国民经济学及实证主义所包含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展开的批判。马克思看似无批判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开始引入稍后在1845年才全面展开的社会及社会化思想，连同在《1844年手稿》的第三部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专门讨论，已经表明马克思开始尝试超越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而且，正是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开始清理“粗陋的和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并实现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新的、统一的理解，随之使得他自己所要追求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人类学。超越的标志当然是基于对实践的新理解而明确提出的新唯物主义。不过，马克思彻底超越费尔巴哈，提出以改变现存世界为旨的新唯物主义，本身又是其1843年激进政治主张的彻底化——自1842年以来，马克思

---

<sup>①</sup> 马克思：《1844年手稿》，第3页。

就不满意于费尔巴哈对现实政治的漠视态度。马克思所谓政治批判,并不只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批判,而是体现为无产阶级即新的历史主体的政治解放。第一,政治批判必然要求落实为社会革命,并体现为社会主义的实践建构。马克思既批评激进主义者如卢格那种缺乏社会精神的“社会革命”,也批评把社会革命完全还原为狭义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sup>①</sup>,已经意味着马克思要强调政治批判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关系。此后,马克思其实是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统一于社会解放,基于此,马克思才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统一起来。第二,政治解放必然要求表现为无产阶级政治意识的觉醒。政治解放之所以不能限于资产阶级,正是因为资产阶级不可能承担起历史主体的政治解放使命。马克思要求无产阶级超越个体、民族性乃至国家,达到一种普遍性的人类意识,并承担世界历史主体,实现面向世界历史主体意识的生成。这当然是为后来卢卡奇所特别注重的方面,但青年马克思在展开对市民社会、犹太人以及德国人的批判时,已高度关注无产阶级的普遍的政治解放问题。第三,政治解放落实于私有制的克服以及财产关系的重新占有。因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实际上必定要体现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批判,这一批判其实质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批判乃政治批判的具体化。行文至此,也许我们才有些明白:马克思何以认为只有费尔巴哈式的哲学人类学才能最深刻地实现对国民经济的批判——马克思实质上是借费尔巴哈而肯定哲学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的实质不外乎是马克思毕其一生关注的人类解放问题,不仅是青年马克

<sup>①</sup> 在1844年以后,马克思认识到,政治革命的确需要在社会革命的意义上展开。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是政治革命的目标,并且作为目标它存在于政治革命之中。相反,如果把政治批判塞入形式的社会革命中,便依然只是停留于激进民主主义。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讲:“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要么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话(如果普鲁士人[卢格——引者注]把‘社会’革命理解为政治革命相对立的‘社会’革命,可是却赋予社会革命以政治精神,而不赋予它以社会精神);要么‘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只不过是以前人们所谓的‘政治革命’或‘革命’的同义语……如果说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不是同义语就是废话,那末具有社会精神的政治革命却是合理的思想。”又说:“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88—489页)这一思想表明,马克思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在对革命的理解上,则在一般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中引入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扬弃了空想社会主义及其改良路线,并把社会主义合理地理解为一个切实的目标。这本身也可以看成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的社会化思想的延伸方式。马克思是否进而延宕了共产主义,倒真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随后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社会主义革命无疑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形式,而“无产阶级”这一在1843年前后稳定的历史主体,则开始在称谓上为工人阶级所取代,而《共产党宣言》中有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学规定,更像是《1844年手稿》的彻底化,但对人类解放的最精彩的分析,依然是在《1844年手稿》中。在研究青年马克思从激进民主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的转变过程时,《1844年手稿》更是绕不过去的。